

荣跃明 张炼红 朱红 ◎ 编

历史傳統與當代語境

《陈伯海文集》出版研讨会纪念集

荣跃明 张炼红 朱红 ◎ 编

历史傳統與當代語境

《陈伯海文集》出版研讨会纪念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陈伯海文集》出版研讨会
纪念集/荣跃明,张炼红,朱红编.—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5520 - 1417 - 4

I. ①历… II. ①荣… ②张… ③朱… III. ①《陈伯
海文集》—出版工作—文集 IV. ①G23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870 号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

——《陈伯海文集》出版研讨会纪念集

编 者: 荣跃明 张炼红 朱 红

特约编辑: 张小忠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1417 - 4/G · 561

定价: 88.00 元

序

汇聚同道 示范后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 战

陈伯海先生研究领域广泛,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在学界有口皆碑,也是我院的硕德耆宿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隆重推出六卷本《陈伯海文集》,我们借此机会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目的就是汇聚同道,共同探讨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问题,交流各自研究心得,以此致敬前辈,示范后学。

陈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中国诗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兼及文艺理论、美学、哲学、中国文化诸相关领域,在倡扬文学史宏观研究、致力唐诗学学科建设、推进文化传统的现代阐释以及建构生命体验论诗学与美学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研究成果曾获首届中国“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和多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唐诗学引论》得韩国学界人士译介出版,获韩国学术院奖。陈先生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于2008年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杰出学术贡献奖。

陈先生担任文学所所长期间制定的“文学、文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如今文学所“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性研究并举”“文学、文化研究并重”的研究方向与学科发展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退休后,陈先生仍然坚持学术探索,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变、哲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令人感佩。《陈伯海文集》六卷本即包括唐诗学、中国文学史学、古文论、中国文化、哲学与审美、文

艺评论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种不间断学术追求的精神,不止体现在陈先生一人身上,同时也是社科院的普遍现象,诸多老同志至今仍孜孜科研。在这里也祝愿老同志们身体健康,学术追求不断圆满。

此次研讨会规模较大,涉及领域较广,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能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具有前沿性、标志性意义的学术盛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同时彰显文学所和社科院在推进人文学科发展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目 录

序·汇聚同道 示范后学 王 战 1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

——我的探索之路 陈伯海 1

上 编

陈伯海先生学术贡献的意义

——为陈伯海先生八十寿辰及《文集》出版而作 董乃斌 11

陈伯海先生及其唐诗学研究 蒋 凡 20

形上之思的深刻意义 陈超南 25

从《唐诗品汇》到陈伯海先生建构的唐诗学体系 张寅彭 28

诗性生命的理性重构 詹 丹 31

眼光与方法：唐诗学建设工程 查清华 35

本色是书生，立意在创新

——略谈陈伯海先生的为人为学特点 祁志祥 43

唐诗学和唐诗接受史的演进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几个片段 朱易安 49

整体观照与理论自觉

——读陈伯海先生文集心得 杨万里 64

从新生命哲学看陈伯海先生的儒家情怀

——《回归生命本原》读后 刘 强 69

中国诗学的三个界限

——陈伯海先生著作三种重温有感 朱生坚 76

下 编

“左图右史”的传统及图像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刘跃进 周忠强	87
略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	傅 刚	101
唐诗文本论纲	陈尚君	112
中国抒情技艺的一个秘密	胡晓明	128
张华《情诗》的意义	曹 旭	143
苏联理论模式与中国学术重建	夏中义	162
“演义”考	谭 帆	168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

——《中国诗歌通史》撰写中的理论思考	赵敏俐	185
--------------------------	-----	-----

关于王元化年轻时的信念

——读陈伯海先生“至老弥坚”说有所思	陆晓光	209
欧化白话文潮流为什么没有在明末清初时兴起	袁 进	233
《庄子·庚桑楚》析义	张文江	244
论审美意象的创构	朱志荣	270
北宋前期太湖流域经济圈形成及其文化影响	傅蓉蓉	282
古典文学中的“心香”意象考索	朱 红	297
实斋论稗——观念、文本与指向	许 蔚	309

附 录

口述小传	陈伯海	321
“学”与“思”		
——我的学术人生谈	陈伯海	329
当代学人如何面对传统(《文汇报》访谈录)	陈伯海 李纯一	342
陈伯海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克勤	350
我所接触的陈伯海先生	徐培均	353

一个真实的人	胡光波	356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		
——《陈伯海文集》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 红	370
恭贺陈伯海先生八十寿辰(五言古诗四首)	夏咸淳	374
贺新郎(《陈伯海文集》出版有感)	蒋哲伦	376
为陈师研讨会敬贺	傅新营	377

历史传统与当代语境^{*}

——我的探索之路

陈伯海

参加今天的会议，先要对各方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一是要感谢我院出版社特别是责编陈如江先生一手策划、编辑并出版了这套《文集》，给我的学术生涯留下一个纪念；二是要感谢会议的主办单位及相关人员，花费大量精力来组织这次会议；三是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全体所内外朋友们、同事们、同行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会议，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作为《文集》的发布，我本来只需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谢忱即可，不必多加言说。但所领导希望开成一个具有学术内涵的研讨会，且要求我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是不能不谈一点实质性的内容。我想还是从眼前的《文集》讲起，就我自己走过的路作一简要回顾。

这套《文集》主要收集我发表出来的东西，整理时补入少量未加刊行的札记，基本上仍属已发表的。最早的一篇发在 1960 年，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前后跨度半个世纪以上，按学科类别分编成册，也算是毕生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个汇总了。

为编《文集》，去年我花不少工夫重读自己写过的东西，系统梳理了一遍。看下来的感觉，不是非常欣慰，却带有几分苦涩。为什么？因为一生精力耗进去了，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实难令人满意。其不足之处在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我给它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叫做“驳杂不伦”，即内容太泛漫太庞杂，不符合做学问的规范。做学问是讲求“专”和“精”的，只有“专”了、“精”了，才能把学问做深做好，像我这样“跑野马”式的东一抓西一拿，至多搞成个“半拉子”，一样也做不深透。这是从学术价值上来加以衡量。而若换个角

* 此文系陈伯海本人在《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由录音记录加工整理成稿。

度,作为个人思考的结晶来看,那么我也有个自我鉴定,叫做“半生不熟”。也就是说,尽管我这一辈子都在勤心探索之中,但总未能达致成熟的境界,只能称之为“半生不熟”。所以重温自己的习作时,并不能感受到充分的安慰,倒确是有那么一种酸涩的成分存留心头,毕竟一辈子耗在其中了。这里当然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缺陷,不能详述。

尽管如此,我倒也并不特别感觉后悔。从读书求知中寻求快乐,原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读书除了能打开人的眼界外,其最大的作用还在于引起积极的思考,思考有所得,一旦豁然贯通,会给人带来无穷的乐趣,这就构成了最大的享受,也是我所追求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虽由于自身功力的限制,做出的成果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在做的过程中毕竟思考过了,享受到这个乐趣了,“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下面就来谈一谈我思考、探索的经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总的说来,我思考的范围虽广,关注的焦点则比较集中,如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致力于把握传统和当代之间的关系。我本人长期从事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属传统文化领域,但我这个人却活在当下,身处的是当代语境,脑子里装满的也是当代意识。作为一个当代人应如何看待传统,又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把传统引入当代语境,这是我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探索之路大体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当然会涉及其他方方面面。

思考下来呢,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当下的创新自离不开历史的承传,而承传亦终须落脚于创新,这是一个双向对应的辩证关系,决不可任意分割开来。

先就前一方面关系而言,当代学人立足当代,致力于学术创新是很自然的。但创新不能凭空着手,新的理念要从既有资源中提炼出来,离开对传统的依托实难进行;且传统愈是厚实,可供选择与利用的资源愈加丰富,创新的空间便愈有开拓的余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我们这个民族本有三千年以上(从《诗经》算起)的古文明传统,近一百多年来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加以现代化变革中自身经验的积累,实也构成了某种新的传统,如此说来,我们的资源很丰富,对创新极为有利。但以往是怎么做的呢?先是用西方文明打压民族固有的传统,接着用“苏联先进文化”来否定“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后又在“反修防修”的名义下抵制苏俄文化,“文革”时更把我们自己百年来的新经验、新积累,包括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传统也一概划入“文艺黑线”。这样一来,只

剩两手空空,光凭几句概念化的口号要来树立“样板”,创新便被逼进了狭窄的死胡同。幸好改革开放扭转了这个局面,外来的新浪潮得以引进,固有的传统受到发扬,有了多方面资源为凭借,才能出现今天学术繁荣的气象。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倚重传统并不等于万事俱备。创新故不离乎承传,而承传的最终取向仍在于创新。如果只是将传统尊奉起来,收拾辑补,清理打扫,加以守望而不使坠失,虽有意义,却还是达不到推陈出新的要求。当然,各种辑补清理工作都是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更正确也更全面地把握传统,是开发和利用好传统资源的前提,但“清点”的目的毕竟在于“盘活”,只有用活用好既有的资产,才能源源不断地孳生出新的财富,即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新的研究课题与内容乃至新的学科生长点与部门结构,一句话,也便是我所着意追求的学术创新了。总之,传统与当代不容割裂,建设当代须凭借传统,而用活传统仍是为了推进当代,二者缺一不可。这是我在长期工作中所形成的基本观念,想来能得到大家认可。

然则,借助传统以构建当代,究竟当采取怎样的途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前期和后期的思考重心亦有差别,想借此机会稍稍展开来说几句。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的注意力多用在如何在从传统当中发掘和提炼出一些带有普适性的东西,用以为建设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借鉴。当时的思想界也十分活跃,讨论宏大议题的甚多。记得有一次参加座谈会,听一位年轻学者(可能是哲学专业的)发言,大意是说:我们过去搞哲学,只是为了判定哪个哲学家属唯物主义阵营,哪个属唯心主义阵营,今后再也不能这样搞了。研究哲学要干什么?就中国哲学而言,归根到底是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究竟是怎样思维的,因为哲学即体现着人的思维方式。听了他这番话,我当时很有一种震动感。我也在想:我们搞文学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以往的文学史著述亦常致力于划分谁是现实主义者,谁是反现实主义者,至多添加一顶“浪漫主义”的帽子,再或加几条“情景交融”“白描传神”之类艺术标签。这样一种套板式的陈述,对当代文学的推陈出新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看来研究中国文学,也应该归结到诸如我们的民族是如何审美地感受生活,又如何审美地表现自己的感受这类问题上来,这才能开阔思路,让传统得以生气勃勃地活跃于当下。

正是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我在 80 年代中叶倡议开展文学史的“宏观研

究”，强调研究时要树立宏观意识，便于从民族传统中去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特质和体现规律性的现象，将其提升至理论高度，以开拓当前文艺活动的视野。与此同时，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我提出了建设“唐诗学”的构想，实亦是着眼于从宏观、整体上来把握唐诗性能的需求。这些提法在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当然也有不赞成的，认为倡扬宏观会导致脱离微观，产生“假、大、空”的弊端。其实我并不否认微观研究的作用，更不拒斥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宏观概括必须建立在微观论析的基础之上，考订史实是从事理论总结的前提，这些道理自是明明白白的。我只是主张研究者需要建立一种宏观的视野，便于将微观观照或具体考订的结果，上升到宏观层面来重加审视，以利于作出含带理论意义的归纳与判断。这期间写成的《唐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二书及一系列相关论文，正体现了上述主张。其中具体论述部分自会有许多可商榷之处，而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探索与实验，是否还可保留某种参考价值呢？

不过我自己的观念也是不断有所变化、发展的。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对过去深受影响的黑格尔“唯逻辑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黑格尔主张“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并不错，但他把逻辑放到第一位了，经常让历史来迁就他所设定的逻辑，引起众多非议。“唯逻辑论”者必然偏爱事物的普遍性，甚至不惜让普遍性来吞噬掉各种特殊性与具体性。但实际上，事物总是处在运动过程之中的，并不存在不可移易的秉性，通常所谓的“普遍性”只能就一定范围而言，不具有绝对的意义。就好比我在谈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时，列举的一些名目如“杂文学的体制”“以复古为通变的发展道路”等，用于传统文学可能合适，摆到新文学创作中就显得扞格不入，说明事物的“普遍性相”自有其限度，不可随意搬用。讲规律也有这么个问题，是不是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的必然性”呢？当然，一定的规律性是客观存在的，那是指事物发展必有其内在的根据，有了根据，才有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但实际上，由于事物内外连结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其自身的根据也往往呈开放而多向的态势，只有在经过各种条件的互动之后，最终落脚到某个点上，才使得某种可能性演变为现实性。一旦达到了这个结局，回过头来追溯其因果逻辑，我们会将它的实现归诸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其实是对实现了的可能性的一种提升，并非预设和前定。而若是先天注定，哪还有事物多向发展的前景呢？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反思这类问题，对以往特别重视的普遍特质与规律性现象，虽不加断然否定，却要求给予一定的规约与限制。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包容关系,不同意把它们分割开来对待。90年代起,我从提倡文学史宏观研究进入“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的研讨,碰到了“文学史研究究竟为的什么”这样一个话题。不少人对此持“还原”说,主张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复现其“原生态”,还其以本来面目。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以为“还原”不可能实现,书写历史必然是一种“重构”,甚至将“重构”等同于制作“神话”,其功能在于为现代人提供某种适用的“意义”。我不赞同“神话”之说,承认历史确有其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还原”也有其必要,毕竟立足史实才有说话的依据。但我同时强调历史的“原生态”不可企及也不必企求,因为历史不属于封闭的“定格”,乃是永远开放着的流程,“过去”也并非简单地过去了,它向着当下且通过当下向未来生成。所以现实中必然时时能发现历史的种因,而传统亦将跟随当代生活的演进以获得其意义上的不断更新。这个问题在西方世界基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是一脉相承的,近现代社会里保留并发展了中世纪原有的许多因素。但在我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情况却有所变异。我们的现代化受列强势力逼迫而仓促上马,在很大程度上靠引进外来机制以开启行程。引进之时,自身传统里原有许多可以成长或进入现代的成分,还来不及从旧体制结构中剥离就被卡住了,也有被引进的外来成分所遮蔽了,于是造成民族传统和现代社会之间某种疏离和脱节的现象,导致现代文明的创建上缺乏民族精神的有力支撑,也使得既有的传统资源难以充分得到成活。要改变这一状况,让中华民族彻底地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必须着力打破传统与现代的隔阂。这就是我从90年代中叶起给予全神贯注的“传统的现代转化”的问题了。

有关这一问题,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成中英等早在七八十年代间即有倡言(他们称之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在我们这里似未引起足够注意。90年代中叶,“失语症”一说开始流行,随即有“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口号提出,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议。赞成与反对者双方打了多年笔仗,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是从原则上认可“转换”说的,提出过“激活”传统以参与现代文明建设的主张,但不想长久停留于理论申辩。依我之见,各家观点既已亮出来了,要说的道理也都说了,与其反复辩难,何不着手做一点实在的样品让人检验一番呢?于是新世纪伊始,当我将手头原有的任务作一了断后,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课题上来。十多年间,总共交出四本专书,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且选择不同的路径进行探索,成为我后期研究的重心所在。大体说来,我是在阐

释、构建和应用三个方面来从事这一实验的。

首先是阐释,以2005年写成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为代表,其研究对象为古典诗学。做法上,我从古文论自身传统出发,抓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2个(或曰12组)范畴及命题,各立专题,按其内在关联排序,逐一解析其涵义的生成、演变,并尝试与现代及西方文论中的相应理念作比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我是现代人,脑子里装满了现代观念,如果再按现代文论的架构来谈论古文论,一下子就会把它现代化,古文论也就失真了。而今我站在古文论本位上作考察并加解说,解说时自会有现代意识渗入,这才有可能产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和碰撞。我还考虑到以往搞比较文学的海外学者也试行过阐发研究,但出了一些毛病,根子在于单向阐释,即单纯借用西方理念来整理和解读中国的材料,其结果只能是把中国的事象全纳入西方理论框架里去,导致民族特色的消解,而亦未能为理论自身的拓展与深化增添新的养料。所以我定下的方法论原则是“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既要借助现代(包含西方)的观念来观照传统,又必须立足传统自身,用传统的眼光反观现代及西方,两相参照,以凸显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同中之异”及“异中之同”,从而在比较与汇通过程中将问题加以推进。这一做法是否取得成效,有待众人评判。

其次是建构,体现在2010年脱稿的《回归生命本原》和《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这两本谈哲学与美学的小册子里。怎么会跳进这两个全新的领域去犯难涉险呢?缘于通过传统诗学的现代观照,我深深感受到中国诗学乃是一种生命论的诗学,它把诗歌活动看作为诗性生命发动和提升的过程,将诗歌文本理解为“言—象—意”层层递进的诗性生命结构。引申开来,我还觉得中国学术本身也是一种生命论的学术,各个方面都浸透了生命活动的气息,而这一精神恰是看重“逻各斯”的西方思想传统所比较缺少的。于是我开始考虑涉足哲学和美学的藩篱,以尝试理论性建构。现在面临的对象不再是古典诗学,却是现代哲学和美学,我是在探寻能否将传统理念引进当代哲学、美学的话题里,通过相互间的交流、融会以形成新的话语。这自是要从找寻西方话语的“缺口”入手。举例说,西方哲学过去称之为“形而上学”,而今“形而上学”宣告终结,人们不再相信世界的本原可以归结为某个“形上”实体。但那样一来,还能不能进行“形上”的思考?设若取消了“形上之思”,又如何来体现哲思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我试着从中国传统里引进“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理念,将这样一种宇宙生命活动看作为世界的本原,用以代替西方哲学固有的实体本根。这一生成论的进路

有无可能为哲学“形上之思”提供某种新的机缘呢？又比如我们的传统爱讲“天人合一”，西方思维却重在“主客二分”，两者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性，有无可能适当打通？其实人自身作为自然生命与自觉生命的二重性存在，他和世界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作为自然生命的存在，人必须依托于整个自然界，“天人合一”是其本然状态。一旦进入实践活动的领域，人要将自己设立为主体，以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为职责，则必然趋向“主客二分”，而当其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精神超越的层面，要为自己的终极关怀寻找“家园”之时，又自会从“主客二分”回归于“天人合一”。这样看来，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便也有建立起来的可能。将这一思路应用于审美与艺术活动的考察，我在当代流行的“反映论”与“表现论”之外，特地引进中国传统的“心物交感”说以解释审美体验的由来。我以为“心物交感”似更能把握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确切性能，是“反映”和“表现”两说所不能取代的。说到底，就哲思与审美领域而言，我只能算是个“试水者”，试探在会通中西的条件下能否形成某种具有新意的理论建构，粗率与肤浅在所难免。

于是第三步，进入应用，试验将阐释与理论建构中所形成的某些观念用于原先从事的唐诗研究。这便是新近撰著的《意象艺术与唐诗》一书了。此书以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生成与流变为背景，着重探讨唐诗艺术的基本性能及其演化轨迹。书中对“意象”的定位以及意象艺术三个层面（意象思维、意象结构和意象语言）的解析上，都贯穿着我本人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诗学观与美学观，并注意揭示各历史时期士子文人生存方式、生命理念的变化与其诗歌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应用自亦是初步的，与理论阐释和建构中的粗略浮浅正相适应。我意识到自己的不成熟，不成熟而又要努力做出来并发表出来，不怕贻笑大方，是因为我想我毕竟动手做了实验，摸索了若干途径，给出了若干实例，可供学界进一步讨论和评判，或在此基础上改进、拓展。热切期望有关“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重大议题的争鸣，不要老停留在“什么叫转换”“能不能转换”之类抽象的议论上，要有大胆的实践，也要有切实的批评与解剖，才能将问题不断推向前方。

末了，再声明一句，我的整个探索都是很受局限的。一受局限于学问根底的不足。我们这代人，论旧学修养，远不及自己的师长辈，就新观念的接受而言，又比不上“文革”后出道的新一代。阐释与建构都需要中西古今的会通，学力不足，难免出差错，专业人士看来毛病很多，影响到思想的说服力，这是无可奈何的。还有一个短缺，乃是对当代语境的把握不深不透。将传统引入当代，

除了要在传统资源上狠下功夫外，亦需要吃透当代语境，这也是让我甚感费力的。记得有一次我去做演讲，题目叫“和实生物”。讲完后，一位听众当场发问说，你讲的道理我能懂，但处身现在的世界、现在的社会，怎么才能做到“和实生物”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孔子讲过“礼之用，和为贵”，墨子也讲到“交相利”则“兼相爱”，今天的世道究竟要建立怎样的规范、制度或采用何种公平互利的原则与保障，才能形成和谐共生的局面，自要作深入调查和专题研究。而若失落对当代语境的深切把握，单纯的人文关怀是很容易蜕变为美丽的乌托邦的。所以我总认为自己一路走来终不踏实，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都来尝试走走，共同闯出一条建设民族新文化、新学术的康庄大道来。谢谢！

Hee

上 编